

文史資料選刊

第二期

- 访袁崇焕墓庙 沈信夫
马汉三之死的前前后后 华清
漫话青山居玉器市 李启元 陈德光
从金台书院到东晓市小学 陈德光
月盛斋马家老铺 马霖
旧北京的黑猴儿帽店 李建平
艺坛沧桑话今昔 高凤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崇文区委员会编

85

PDG

文史資料選刊

第二期

- 
- 访袁崇煥墓庙 沈信夫
- 马汉三之死的前前后后 华清
- 漫话青山居玉器市 李启元 陈德光
- 从金台书院到东晓市小学 陈德光
- 月盛斋马家老铺 马霖
- 旧北京的黑猴儿帽店 李建平
- 艺坛沧桑话今昔 高凤山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崇文区委员会编

85

访袁崇煥墓庙

沈信夫

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内，有“有明袁大将军墓”；左安门内有“袁督师庙”，是北京市有名的古迹。这位袁大将军、袁督师，就是明朝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在山海关一带抗击后金（清）军的袁崇煥。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我人民政府修葺了袁崇煥墓、庙，碑石俨然，殿宇整肃。但这些年来，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当年修葺的工程到今天又发生了变化，寒烟衰草，日渐凄凉。前不久，笔者凭吊了这两处墓、庙，访问了熟悉墓、庙的人士和多少代看守袁墓的余家子孙，并参阅了一些记载袁崇煥生平事迹及其墓、庙的资料，仅就所见所闻记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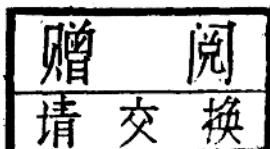
袁崇煥，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从其父袁子鹏起移居到广西藤县天平乡白马村（又名莲塘村）^①，所以谈迁的《国榷》说他是藤县人；白马村和平南县接界，平南人称之为白马墟，因而清朝道光年间修的《平南县志》，又认为他是平南人。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煥中进士，授福建邵武县知县。这时努尔哈赤（即后来的清太祖）的后金军（清军）步步向山海关逼近，袁崇煥“为人慷慨负胆略”，“以边才自许”^②。公元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袁崇煥奉命“监关外军”，筹划抗敌事宜。后来清朝人写的《明史》追忆当时情况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袁崇煥始。”公元一六二二年后五年多的时间里，袁崇煥率领军队和后金作战，打败了努尔哈赤的大举进攻，努尔哈赤受伤而死。其后，又一度打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为了缓兵之计，袁建议明廷与皇太极“议和”，天启皇帝始允终悔。大约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十月左右，袁崇煥被迫辞官回到广西藤县。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再次起用袁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加太子太保衔，赐上方剑、蟒玉、银币。袁崇煥第二次出关抗敌。他杀死不听指挥并与后金勾结的东江总兵毛文龙。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冬，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煥防区，不进山海关，取道蒙古以蒙古兵为先导，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星夜从山海关驰援北京。“当时，他的军总部就驻在今日的龙潭湖岸畔，部队则驻扎在龙潭湖到新西里三号张园遗址^③一带地方^④”。这时候，魏忠贤阉党余孽上书崇祯，说袁崇煥要逼迫明廷订城下之盟，并指责袁“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对此半信半疑。皇太极趁机制造反间计。据朝鲜人朴趾源的《驿讯随笔》记载：“清人设间，使其将高鸿中于所获两明太监前，故作耳语曰：‘今日辍兵，意者袁巡抚（是袁崇煥旧职）有密约。顷见二人来见汗（指皇太极），语良久而去’。杨太监佯卧而听之。旋纵之归，遂以告于帝。遂下崇煥于狱。”一六三〇年（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煥被杀于西四甘石桥下牌楼地方。

① 见光绪年间所修《藤县志》。

② 《明史》。

③ 张园在今左安门附近。

④ 见《北京街道的故事》，



2096/2

袁崇焕死后，没有人敢去收尸。张江裁写的《燕京访古录》说：“暴尸于市，其仆潮州余氏窃负其尸，藁葬广渠门内，即今广东旧义园中，守墓终身；比卒，乡人义之，遂附葬其右。至今守墓者皆余氏子孙。”

一六五七年（南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流亡云南的明永历帝朱由榔追复了袁崇焕的原官，并赐谥“襄愍”。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乾隆为了沽名钓誉，也下诏寻求袁崇焕的后裔，要“量才录用”。至此，袁崇焕的事迹人们才敢公开谈论。然而有关他的著述很少，这是因为从清朝来说，歌颂袁崇焕，势必要谈到他的战功，也就势必牵涉到努尔哈赤战败的历史。因此，即使有人记载，也不敢公诸于世。

辛亥革命那年，山东荣成人赵克生和陈子丽曾往袁墓并有诗吊之，说袁崇焕是“山海长城寄一身”；又为余义士墓题诗，有“天留忠骨伴将军”之句^①。《东莞袁督师后裔考》（张江裁著）一书中记载，当年张江裁随其父张伯桢访袁墓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墓前有焚馀纸灰，询之守墓人余琪，琪告以督师后人来祀”。一九一五年，张伯桢倡议，以袁崇焕配祀岳飞庙，并捐金在北京左安门内新广东义园建立“袁督师庙”（一九一七年建成）。一九一六年张伯桢的小儿子病死，就葬在袁庙旁边，以示对袁的景仰。每逢清明，客居京师的广东人，都要到袁墓前公祭。祭品用一烧猪（沿粤俗）。东莞人明伦说：“余曾充粤馆值年，屡主祭焉”^②。

以上这些材料说明，自袁崇焕冤死后三百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约在一九三〇年成书的《燕京访古录》，对袁墓和袁庙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袁督师墓”条下记云：“……墓前丰碑屹立，上题‘有明袁大将军墓’‘南海吴荷屋书’。”

“袁督师庙记”条下云：“袁督师庙在北京左安门内东火桥。庙额字大一尺，以石为刻，题曰‘袁督师庙’，下款‘丁巳’（按：为一九一七年）三月乡后学南海康有为书”。庙前有石联，高与庙齐。联云：“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中原将帅（按：现存的石刻为“东辽将帅”）。《燕京访古录》误），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下款“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夏五，乡后学康有为撰并书”。庙内正中，立袁督师石刻像，须眉生动，令人肃然起敬。其石像上悬一额，曰‘听雨’，乃督师自书遗墨。两旁悬联云：“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下款“乡后学南海康有为撰并书”。庙内有大石一幅，刻康南海先生所撰书之《袁督师庙记》。《记》后自题一诗曰：“先哲勤勤表绣丝，瓣香特为督师祠，白山黑水海翻立，鼙鼓声中我有思。”字字工楷，笔笔逋峭。又一石，刻新城王树枏所撰《袁督师庙记》（按：石刻为《袁督师庙碑记》），醴泉宋伯鲁书。又石刻家君（按：指张伯桢）所撰《余义士墓志》（按：石刻为《余义士墓志铭》，旁注“附录”二字）。又一石，刻督师遗诗数十首（按：为九首），亦宋伯鲁书。庙左为‘意钓亭’，则家君供奉袁公香火时，以为休息之所。庙前遍植松柏，今已成荫。循庙而下，行数十步，面临芦田，青翠欲滴；有小墩，门植两槐，则家君所筑钓台也。又循钓台而下数百步，柳色宜人，清气扑眉宇，坎方封覆以新土两围，松柏苍莽可爱，则家君自营生圹也。”

此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北京街道的故事》载：“在北京张园故址，曾经建有一间袁崇焕纪念堂，堂里有康有为写的石刻联语一副：‘天地皆春色，乾坤一草庐。’这间纪念堂和石

① 《燕京访古录》

② 《东莞袁督师后裔考》题辞。

联，在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军队破坏，园中所有其他建筑物和花木，也都破坏一空，砌在墙上的袁崇焕遗笔‘听雨’二字的石额，幸得保存。解放后，移砌在祠堂（按：指袁督师庙）门内的墙上。”

以上这些记载，把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袁崇焕墓、庙的概貌，生动地描绘给后人，并使我们知道墓、庙的来历和变迁。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笔者再访袁墓和袁庙时，已非旧观了。

袁崇焕墓所在的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五十二号后院，是今北京市第五十九中学操场的一角。斜街五十二号大门，为竖立栏杆式红漆木门，对开的两扇，各宽约一米，门楣上有挂匾额的痕迹。据北京教育学院崇文分院王金钟老师回忆，一九六一年他曾见过袁墓大门上的匾额，为叶恭绰先生所写，可惜匾额早已不知下落，题词也已记不清。入大门，左右各有屋三间。穿过小院，正面有瓦房五间，甚为高大宽敞，但两旁用砖砌死，与墓地隔断。房屋已成为民宅。出斜街五十二号大门，右边便是第五十九中学，楼房耸立，占地甚广。原在该校操场一角的袁墓现已不见，只躺着一块长二百五十三厘米、宽七十五厘米、厚二十七厘米的大青石碑，正面刻“有明袁大将军墓”七个大字，每字三十五厘米见方；右上刻“大清道光十一年二月”，左下刻“乡后进吴荣光拜题”。字体为封建时代标准的“馆阁体”。碑背无文字。

在五十九中学工作了三十年的石宗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袁墓的变迁情况。过去东花市斜街只到卧佛寺为止，往东叫余家馆（按：再以前叫余家弯，因看守袁崇焕墓的义士余某而得名。此处街道比较弯曲）。十年内乱后期，余家馆并入斜街，但有的商店至今仍以余家馆做字号。今天的东花市斜街五十二号就是过去的余家馆一号，附近的人称之为广东义园。当年这里街道地势低洼，经常积水。余家馆一号门前有石头台阶七八级，两旁有矮墙随阶而上。白石红门，很是壮观。今天斜街五十二号的红门，还是当年旧物。门上原有白地黑字匾额，挖防空洞时被摘下当作跳板用，以后即不知去向。入门后，通道两旁有小型石狮子一对；门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看坟人余家居住，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客居北京的广东人死后，一般都待择期安葬，运回广东的不多。迎面正房五间，平时是扫墓人休息处；据老人说，过去每逢年节，挂上袁崇焕的画像，余家人香烛供奉。正房后面就是袁墓，圆形，高出地面约二米，涂成白色。墓前立有石碑，即现在倒在地上的那块石碑，碑前有长方形石桌。墓旁有一座稍小的坟头，相传即义仆余某的墓。墓地四周栽有松柏，松柏四周是红砖砌的矮花墙。以上这些都在一九五二年经人民政府修过。矮花墙外一大片荒冢，埋着一些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荒冢四周有枣树二三百棵，秋季收枣很多，是看坟人余家的生活来源。每逢清明、农历七月十五及冬至前后，扫墓的人很多，凭吊袁墓的人更多，有广东籍人，也有外省籍人在袁墓前祭奠。有的人还给余家送钱送礼。据说蔡廷锴等也来过。

一九五五年，政府决定利用这块广东义地建立学校，伐去枣树，迁走荒冢，但袁墓和墓前的房屋未动，并在矮花墙外又砌一道高墙。为了照顾看坟人余汉卿一家的生活，就招收他和他的女儿余幼兰为第五十九中学的工友，余汉卿非常感激。石宗炎同志说，余汉卿还经常对他谈些有关袁崇焕的传说。十年内乱中，有人造谣说“袁崇焕的头是黄金做的”，于是袁墓遭到破坏，坟墓被挖开一丈多深，也未找到“黄金头”。至于有无尸骨，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了。结果，坟成了平地，石碑被推倒（碑座还埋在地下），石桌不知去向，高矮两道墙被拆除，墓前边的房子与墓地也被隔断，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余汉卿在十年内乱中

病死，他的女儿幼兰和儿子小宝也都搬走了。

听了石同志介绍情况后，笔者辗转访问了余幼兰。她已经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在某房管所当工人。她所记忆的没有超过石同志所说的范围，但她记得祖父叫余恩兆，并说弟弟叫余宝林，住大红门一带，为某公司的工人。笔者又找到余宝林，他年约三十岁，对前辈的事一无所知。

袁督师庙，在今左安门内龙潭公园正门东湖岸边，由该公园管理处占用。参照上述《燕京访古录·袁督师庙》条下所载，庙屋外形大致仍存旧样，其他则面目全非。庙原为坐西朝东，原来的东门现已砌死，另开西门，改为坐东朝西。东门上的石刻依旧。庙屋已被隔成住房三间。庙中袁崇焕的石刻像，像上的悬额，“听雨”二字和两旁对联，已不存在。但屋内有做桌子用的正面朝下的石板三块，其中一块，用手从下面抚摸，似为人像：头戴方巾，有耳有目，惜石板太重，无法翻看。在这里，要附带说一下袁崇焕手书“听雨”匾额的问题。《北京街道的故事》说此匾是石刻；《燕京访古录》说是“悬挂的”；据名书法家，八十八岁老人萧劳先生说，是木刻的。他青年时期常去袁庙，亲眼所见，记忆犹新。是否在石刻之外，又仿制了一块木刻呢？容待续访。

庙内中屋北墙上砌有石刻一块，宽三十九厘米，长一米，其文为：（标点是笔者加的，以下石刻文字同，有□号者原字已缺。）

袁督师庙记

嗟夫！明清之际，关于中国亦大矣，非只系一朝之兴亡也。观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武□盖世，遂见忌于敌，以谗间死，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夫国非才不立，有国者临□闻鼓，莫不思才而用之。然才愈奇，志愈大，人主未必竟其用，即使倚畀信用，而内移于权奸女谒，外怵于敌国外患，左右谗慝之口，交构而并作，卒自坏长城而国亦殄灭。呜乎！古今殆同一揆，岂独袁督师！吾十二岁，侍先祖连州公读督师传，至其□边事，登长城，察形势，奏思宗期五年破敌而壮之。连州公曰：“是敌畏而用间杀之者也。”后登长城想公之雄风。门人东莞张伯桢为公表微，刻公集，复筑公祠于京师。今后之爱国者思将才，庶公英灵武烈，犹凛凛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九月。乡后学康有为撰并书（下刻篆文“康有为”印）。

南墙上也砌石刻一块，长一百一十四厘米，宽五十五厘米，内容有《袁督师庙碑记》、袁督师遗诗九首、《余义士墓志铭》、杂记庙的方向和出资建庙人姓名等。此石文字甚小，除留出天地头及左右空白外，在长九十四厘米、宽四十五厘米的石面上，刻有五十九行，每行三十至三十二字不等。每个字的大小不到一厘米见方，又加历年来被白灰填抹，几不可认。而石刻内容对庙之兴建叙述极详，为史料所必备；其字迹亦娟秀均匀，极属可爱。赖第九中学教师张美云、天坛中学教师李其威二生之力，手剔日测，竟二日录完。现仅将《袁督师庙碑记》、《余义士墓志铭》和袁诗照录附存。

袁督师庙碑记

醴泉宋伯鲁书

东莞张篁溪既刊其先正袁元素督师遗集行世，又上书政府吁请合祠关岳庙，以奠忠魂，昭之万世。今年八月复创建督师庙于左安门内广东新义园，以为旅京乡人岁时荐享之所。呜呼！古今之以忠死国者众矣，篁溪独惓惓于督师若此，此岂私其一乡之见哉？诚以督师之生死，为明、清兴亡之所繇关，而种族之见，遂酿为四千余年之世局之变而不可收拾，此尤篁溪所痛心疾首者也。或谓督师之死于清人之间，温体仁、梁廷栋、满桂之私嫌，固也，余独窃谓此不足以死督师，死督师者中官耳！杨太监之言入而督师死；魏忠贤之遗党高栖、袁宏勋、史蕴辈之疏入而督师死。东江岁饷，毛文龙藉以贿中官者也，文龙死而中官之路断矣，围城之役，遂乘机麻起而漫润之，于是督师不得不死矣！嗟乎！中官之祸，明二百七十年几如一辙之覆，卒以此殃其国而亡其身。其可异者，当时之僇辱忠良，曾孟子所谓土芥犬马之不若，而明社一屋，怀忠抱节以死国难者，若蚁趋而鳞萃也。清无有明之一矣。逮其末也，而婴城效死者百无一二焉。斯则可悲者矣！八月望日，庙既落成，篁溪属余为之记，余又益叹督师之死之系于国运者大也。丁巳八月，新城王树枏记。

余义士墓志铭

东莞张伯桢撰

醴泉宋伯鲁书

大明袁督师之仆曰余义士，粤顺德马江人也。执役于督师。督师出必挈之行。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朝廷非罪杀督师，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义士夜窃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不去，死傍督师墓葬。（中略）乃奠幽宫，伐石燕山，铭辞石上。铭曰：“是惟大明义士坟，厥名不传传余君，藩溷之花胡纷纷，兹坟劲草千万春。”

袁督师遗诗

东莞张伯桢篁溪纂

醴泉宋伯鲁芝田书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侶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山海关送季弟南还 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

偕诸将游海岛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

话别秦六郎 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刻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南还别陈翼所总戎 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名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

度庾岭 客路过庾岭，乡关渐已违。江山原不改，世事近来非！瑟哉齐门惯！人宁狗盗稀！驱车从此去，莫作旧时归。

归庾岭步前韵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道说还山是，谁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过河林口占 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抵树满红尘，如今著足空王地，多悔从前学杀人。

北屋墙上砌有大小石刻七方，都是有关意钓亭的文字，并有张伯桢石刻像，疑是从意钓亭移来的。南屋经常下锁，据云是仓库并无石刻，商之主管人员入内一看，终未获允。至于意钓亭、钓台和张伯桢的生圹，以及当日的芦田、小墩、坎方新土等，则不知何时湮没，成为龙潭公园的正门了。

最后，笔者获悉，北京市文物局已指拨专款十余万元，将由崇文区文物管理所负责重修龙潭湖公园内的袁督师庙，并计划设立袁崇焕纪念堂，供中外人士凭吊。

追 记

一九八五年春，崇文区文物管理所已将龙潭公园内的“袁督师庙”修葺一新。林木秀深，石阶整洁。庙门又恢复为原来的座西朝东。庙仍隔为三间：中间屋正面墙上嵌有石刻袁崇焕象，即前文所说“做桌子用”的“石板”。人象全石高三十七公分，宽十一公分。人象高二十四公分，宽六公分。头戴方形儒冠，绣以山水；面微长而有须，神采赫奕；穿元领阔袖衣服；手持笏版，版上与帽齐，下过束带；足登云头花纹方履，稳重大方，俨然风流儒将。石刻右上方隶书“袁督师”三字，下款“东莞张伯桢□题”。再下长形阳文篆书“墓溪”（按：即张伯桢的号）二字。印章。左上方石刻字三行：第一行“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第二行“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第三行“壬申□月袁崇焕”此三行字体挺秀娴熟，与其他书法不同，应是仿袁崇焕亲笔摹刻的。袁象上方无匾额，但龙潭公园管理处存有“听雨”拓片二张，无题名，亦不知来历。是否袁氏手笔，不敢臆断。在北京第五十九中学操场内的袁崇焕坟，也略加修整。堆了一个小坟头，把躺在地下的“有明袁大将军墓”石碑也竖立在坟前。又前文所说的“南屋经常下锁”，今已开放。屋内墙上有文字石刻九块，女象一方，题“悼亡亭”三字，是纪念张伯桢夫人蔡氏的。两旁刻有梁启超写的“门前学种先生柳，日暮聊为梁父吟”对联和墓志铭等。估计也是后人由庙外移来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 沈信夫

马汉三之死的前前后后

华 清

马汉三是前国民党军统华北地区的特务头子。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公开职务是北平行辕督察处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蒋介石下令于南京处死。

马汉三一九〇六年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青年时期曾参加西北军。一九三八年，他以在西北军中有大量旧关系为政治资本，投靠蒋介石的军统特务组织，受到了戴笠的重用，成为军统在华北地区的重要头目。当蒋介石集团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又转而投靠李宗仁。他还私自在军统内部组织“建国力行社”，企图另树一帜，别有打算，最终作了蒋介石的刀下鬼。

解放前在北平，马汉三的累累罪行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样一个反面人物，本无需多费笔墨。但是我想：将我所知道的马汉三之死的前前后后写出来，一方面可以为研究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从一个侧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腐朽与黑暗。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写了这篇东西。

我和马汉三是在一九四一年认识的。我父亲那时住在绥远陕坝，我家住在北平，八月我从北平经陕坝去兰州上学，当时交通不便，要乘大车走一段路，正好马汉三也从陕坝去兰州，他是奉大特务戴笠之命，到兰州去当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的。我和几个同学与他一路同行。我就是这时认识他的。后来马汉三托人向我父亲求亲，经我父亲同意，我和马汉三于第二年秋天结婚，当时我十九岁。直到一九四八年马汉三被处死，我与他共同生活仅六年时间，因此我对他的经历所知甚少。文中所述的事情，有些是我经历的，也有的是听马汉三本人及其亲友说的。如有不当之处，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投靠军统 爬得很快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又名马寒禅、马寒山），河北省宛平县（今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人。幼年丧父，由叔父抚养。马汉三曾在黄村农业专科学校学蚕桑。当他未满二十岁的时候，由于家务纠纷，离家出走。正值冯玉祥在北京南苑招募学兵，他被录取，随冯玉祥的西北军辗转于内蒙和张家口一带。以后被提拔为师部文书，在师长、共产党员宣侠父身边工作（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宣侠父在西北军中是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进行政治工作的）。

一九三八年马汉三投靠了军统，为蒋介石效命。马投靠军统以后，受到戴笠的赏识。一九四一年初，马被任命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处长，公开身份是第八战区傅作义将军的少将参议。一九四一年八月调往兰州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一九四二年初，马汉三又调任财政部绥远缉私处处长，仍回陕坝任职，同时兼任军统五原办事处处长（冯贤年任副处长）。从此以后，马汉三在军统内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有人说：“马汉三是军统非嫡系分子中爬得最快的一个。”

戴笠之所以重用马汉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戴笠身边最亲信的大特务多是南方人，而这些人在北方没有实力，马汉三在北方时间长，在西北、华北地区，他的旧关系都很多。正因为如此，一九四四年春，马汉三被戴笠调去重庆，任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为戴笠重建军统华北局效犬马之力。也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马汉三又被派往北平任军统北平办事处处长，公开职务是北平行营督察处（后改为行辕第二处）处长，戴笠并把他所垄断的劫收大权交给了马汉三。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春戴笠坠机摔死前的半年多时间里，马主要和当时在北平的一些大特务一道劫收敌伪财产。刘玉珠是马的秘书，帮助马搜刮，其搜刮所得由刘玉珠代为经营。当时的大汉奸如汪时璟、黄南鹏等都与马汉三有来往。一九四六年前后，我曾见汪时璟的老婆给马送来貂皮大衣一件，黄南鹏的老婆送来清官郎世宁画的《百马图》画卷一轴。马还与黄南鹏、高德林、柰乐山等人（都是汉奸、伪军头子）称兄道弟，过从甚密。据说这伙人在日伪时期为军统掩护过电台。

当时在北平的大小军统特务，大发劫收财，“五子登科”，敲诈勒索，为所欲为。日伪及汉奸的财产，除了有的入大小特务私囊外，还有大量的黄金、美钞、珠宝玉器、古董、书画等。这些东西马汉三等人也不敢全部据为已有，他们把大部珍宝造册交戴笠转呈蒋介石，后来蒋介石把这批珍宝陆续运往南京。一九四六年春，戴笠来北平时，以马汉三为首的大特务们又搜罗了不少珍宝、古董、名画交戴笠回南京时进献蒋介石。戴笠飞机在南京附近坠毁，这些珍宝也付之一炬了。

罪行累累 略举一二

马汉三是军统华北地区的特务头子，国民党特务此时期在华北地区犯下的镇压共产党、镇压革命人民的桩桩罪行，当然都是与他分不开的。这里仅举三例。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这一阶段，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在南京召开伪国大，另一方面向解放区进攻。国内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青年学生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到各地。这时北平各大学学生也不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九四六年的某日，北平市各大、中学学生决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当日凌晨，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了便衣特务，并携带二百多条手枪、手提机关枪，准备屠杀游行的学生，制造血案。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去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报告，李宗仁害怕事情闹大了，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即命令马汉三将便衣特务撤回。马汉三面有难色。李宗仁严厉地警告马说：“你必须照办，如果特务与学生发生冲突，惟你马汉三是问。”结果这次游行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血案虽然避免了，可是后来特务仍然深夜跳墙进入各大学捉人，秘密严刑审讯进步青年，这些罪行，即是马汉三一伙特务分子干的。此事《李宗仁回忆录》中有记载。

一九四六年春，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部北方三人小组在北平开会时，马汉三等人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打手在北平街头游行，呼喊反共口号，诬蔑共产党，妄图以此破坏谈判，同时也是向美方代表施加压力，给美方代表制造借口，以便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时进一步袒护国民党。

一九四七年二月军调部结束，共产党代表撤离北平，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北平有一电台继续工作。大约九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这一电台，由当时任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倪超凡带领特务、军警破坏了这一电台，逮捕了电台工作人员，抄走了电台密码本，并以

此为线索在北平、天津、郑州、兰州等地逮捕了很多共产党员。中共在这些地方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马汉三参与了这一反革命活动。

马汉三的反革命罪行远不只此，但由于军统内部有纪律，马回家后从不谈他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因此我知之不多。以上几件事，都是我听了解内幕者讲的，或是从一些书中看到的。仅从这几件事，也可以看到马汉三反革命反人民罪行之一斑。

巴结郑介民 开罪毛人凤

马汉三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心想高官厚禄，飞黄腾达。他把“权”看得重于“钱”，常说：“有了职权，钱财自有人送上门来。”为了升官，他钻营奔走，广为结交。那时每逢年节，行贿送礼的人，接踵而来。马把各式各样的礼品，如古玩字画，服装衣料，名酒香烟，糕点水果等，分类排队，上好的（如古玩字画）送给当时的权贵或自己收藏；一部分用自己的名片转送出去；还有一部分送给他的下属。他说，各方面都不可忽略，都要投其所好。他对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毕恭毕敬，对傅作义、何思源也表示尊重，每逢年节都备厚礼亲自去拜贺他们，自以为受到他们的器重。

在军统内部，他看不起毛人凤。戴笠死后他更不甘心居于毛人凤之下，常说自己要离开北平找个小城市作个地方官干几年。这当然不是真心话，不过是几句牢骚而已。尽管如此，他对毛人凤表面上还是奉迎的，毛人凤来去北平，马也送厚礼给他。有一次马去南京之前，刘玉珠给他送来一小袋东珠，大约二三百颗（东珠即日本人工养珠），说是给毛人凤的。

一九四六年春由国共双方和美国代表三方面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北方三人小组。郑介民任国民党代表来北平。郑介民原是蒋介石的老牌特务头子，戴笠死后曾代理军统局局长，军统中的大特务有不少是郑的人。在军统局内部，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与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的矛盾很深，马汉三既反对毛人凤，就想找郑介民这个靠山，所以对郑竭力逢迎。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芳经常带着几个女人来北平游逛。柯爱打麻将牌，在北平时，每天总要有几个人（主要是在北平的特务头子的老婆们）陪她打牌取乐。而且柯每次来平，必然由马汉三的秘书刘玉珠陪同到前门外廊房头条、二条、珠宝市选购大量古玩、珠宝翠钻，货款当然由马汉三支付。经常如此，马汉三感到柯淑芳的胃口太大，难于应付。记得刘玉珠曾对马汉三说，已暗地嘱咐珠宝商人，郑夫人来时，不要只拿上好的给她看，否则，招架不住了。除此之外，马汉三还替郑介民修建南京莫干山路的住房。据文强说，郑介民办五十岁生日，文强去贺寿，柯淑芳对文强说：“文先生，这房子修得好吧？没有汉三，我怎么修得起房子。”郑介民正要在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自然也就看中了马汉三这个有实力的人，对马汉三也另眼看待。马汉三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就是郑介民推荐的。马汉三的野心远不是一个民政局局长可以满足的，他还想窃据北平市市长的职位。郑在北平时，时常到马住处来，郑介民离北平后马汉三与他一直不断书信往来。马汉三与郑介民的勾结自然加深了毛人凤的不满，而马汉三自认为有了郑介民这个靠山，就更不买毛人凤的账，矛盾更加深化。

一九四六年秋，蒋介石筹备召开“国大”，各地选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实际都由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控制。为了操纵选举，一九四七年初北平市政府成立民政局，由马汉三出任局长。从那时起，马汉三的应酬往来就从一些特务、汉奸转到名流、政客中来。各派政客为了捞到“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选票，纷纷前来送礼、请客。马自然把这看作是扩大关系的升官之道。

一九四七年秋，北平选区开始竞选国民党“立法委员”。毛人凤指令马汉三为女特务刘秋芳在北平竞选“立法委员”。刘秋芳是毛人凤的姘妇，家住天津，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大特务李广和的老婆。每次毛人凤来北平，刘必从天津赶到北平公开与毛人凤在一起鬼混。马汉三为此更看不起毛人凤，曾与乔家才（当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后来与马汉三一起被毛人凤逮捕）在客厅里大骂毛人凤不知廉耻。毛人凤的指令马汉三不敢公开违抗，马替刘秋芳提了名，搞了选票。但是刘秋芳最后还是落选了（当选的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王震芬）。这件事曾搞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刘秋芳的落选使毛人凤大为恼火。记得选举结果公布后，刘秋芳曾到我家里来找马汉三，马不在家。刘秋芳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总有一天让马汉三认识认识我刘秋芳！”蛮横嚣张的气焰，令人胆寒、发指。我把这情况告诉马汉三时，马先是面色阴沉，过一会儿说：“真不知耻！到北平来丢丑！以后她再来，不要见她！”本来我并不知刘的底细，后来听别人说：刘是天津有名的女恶棍，她经常带着几个随从，夜晚以查户口为名，去有钱的地方（如银号、钱庄以及其它一些中小企业）持枪进行敲诈，刘并亲自下手开保险柜抓金条。天津解放前夕她逃跑时，运走的东西整整装了一船舱。她不是北平人，又无公开职业，年岁三十岁上下，毛人凤让她在北平竞选“立法委员”，明明是给马汉三出难题。刘秋芳的落选更加深了毛人凤与马汉三之间的矛盾。这也是马汉三被杀的原因之一。

支持李宗仁 惹恼蒋介石

一九四八年春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达到高潮。蒋介石一心要把孙科推上副总统的宝座，不允许桂系的李宗仁染指，因此曾指令全国各地军统负责人竭尽全力为孙科竞选。马汉三虽然是军统华北区的负责人，但他是拥护李宗仁的，想借竞选之机进一步投靠李宗仁。他曾按李的指示，暗地里为李拟了一个竞选计划，为李宗仁竞选奔走；并且曾亲自去南京，为李活动。由于马汉三的活动，华北区的选票大部分落入李宗仁之手，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为此蒋介石大为震怒。马汉三的行为在蒋介石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如果说马汉三与毛人凤之间的矛盾是他招致杀身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次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惹恼了蒋介石，则是他被处死的更重要的原因。

马汉三的死，是蒋帮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通过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蒋政权，特别是特务组织内部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丑恶本质。

暗搞集团 同伙告密

一九四六年初，毛人凤继承戴笠衣钵，执掌了军统大权以后，他自知在军统内部难孚“众望”，于是大肆排除异己。对上，郑介民是他的死对头，不搞掉郑，他就无法获得实权，也无法取宠于蒋介石；对下，不清除郑的亲信，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于是军统局内凡被认为是郑派的大特务，都先后被调职逐走，然后就搜寻在各地的郑的亲信。在北平，矛头自然就落在马汉三身上。

一九四六年以后，在北平北方籍的大特务中，除马汉三外还有乔家才、黄天迈、吴安之、白世维等人。这些人都是看不起毛人凤的，郑介民在军调处任职时，在北平住了大半年，这些人对郑都十分奉承，时常在一起吃喝聚会。毛人凤对此当然非常恼火。先后派亲信来北平监视和搜集材料。如毛鍾新（毛人凤的侄子）、王蒲臣（毛人凤的同乡，马汉三、乔家

才被捕后任军统北平站站长)、李希晨(毛人凤的军法处长)曾几次来往于北平、南京。

马汉三、乔家才被逮捕的第一个罪名是私结小组织，违反军统铁的纪律，即是指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马汉三和乔家才、黄天迈、吴安之等人私下组织了一个小集团而言。该小集团取名为“建国力行社”，马汉三为主任委员，乔家才为副主任委员，黄天迈、吴安之、刘玉珠等为委员(刘玉珠在戴笠死后就脱离了军统，专搞投机倒把生意，在廊房头条设立了“中华信托公司”，利用军统名义大发横财。他是小集团中管财务的人)。此外，这些人还各自网罗了一些亲信。小集团的宗旨目的为何？说法不一。一说是在军统内部拥郑反毛；一说是马汉三等人为脱离军统另外拉帮结派，别树旗帜；一说是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再一说是当时时局紧张，傅作义可能组织华北政府，马汉三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想以此为资本投靠傅作义。

马汉三这样做的结果是自食其果。其实和他在一起称兄道弟的大特务中，就有人经常向毛人凤通风报信。“建国力行社”一成立，条文一拟定，就有人向毛人凤告了密，大特务张家铨就是其中的一个。马汉三利禄熏心，过于自信，对此全无察觉。大特务之间又勾结又出卖，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军统内部尖锐的派系之争。“建国力行社”的组织只不过是在蒋帮覆灭前，这些大特务自知末日来临，进行最后挣扎的一种手段而已。

钻进毛人凤的圈套

一九四八年五月马汉三去南京参加李宗仁竞选后回北平不久，军统局的军法处长李希晨来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明为清理戴笠死后军统的财产，实际上是整理马汉三的材料。对此事马汉三可能有些预感。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北平市长何思源被解职后(何的被解职可能与支持李宗仁竞选有关)马曾在家中说：“时局不稳，北平不是久留之地，要么找个小城市去当地方官，要么去青岛、大连等地闲住几年。”当时华北、东北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北平形势紧迫，许多大特务纷纷准备南逃，马自知南方没有他安身之处，才另有打算。这期间我曾见他在给郑介民的信中说(大意)：“职一生不惯应酬，又无任何嗜好(马常标榜自己不吸烟、不吃酒、不会打牌)，北平是自己出生之地，不敢妄为，遗祸父老，请钧座勿信谣传……”可能郑介民曾向他提出过什么警告。但直到被捕前，马在家中从未说过他会出什么事，也未见他有什么准备。

六月中旬毛人凤亲来北平，这本是专程来逮捕马汉三等人的(李希晨早已在平)，但看不出马等有何觉察，他对毛仍大事应酬一番，并曾说毛人凤可能来家。直到马被捕，毛人凤并没有来过。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我随马汉三去看望一个亲戚，回来路过灯市口时，马说毛人凤找他们开会，就让汽车在路北的一个不大的门口停下，并吩咐车子回来接他。在门口迎接他的名叫佟荣功(稽查处的一个小头目，当时在毛人凤身边担任警卫)，马进去后就被捕了。马的随从和司机回去接他时，也被搜身，拘留了一夜。当晚和马同时被捕的还有乔家才、刘玉珠。另外，民政局的会计杨化勇，兵役科长李效愚等，被认为是马的亲信，也于次日被捕(这二人直到马被处死后，围城期间才放出来。杨化勇后来逃往台湾)。

马汉三晚间出去开会，经常回家很晚。这天直到深夜三四点钟还未回家。这时乔家才、刘玉珠二人的妻子先后来电话询问乔、刘的去处。正狐疑不定，准备分头各处查找，突然，一伙人走上楼来，搜查抄家。这伙人中带头的叫宋元和(稽查处一个大头目，后被提升为军

统北平站副站长)和侦缉队长李连福。他们翻箱倒柜，楼上楼下翻腾半天，最后把箱柜都贴了封条，对我说：“马汉三被捕了，奉毛人凤的命令来搜查。”问是什么罪名，他们冷笑说：“我们怎能知道，你最好别打听。”平时马汉三从不在家办公，因此没有存“公事”的屉柜，结果没有翻到什么文件。接着又去民政局搜查马的办公室。乔、刘两家当夜也被查抄。

终为刀下鬼

此后，我打电话给一些熟人探问情况，却都怕得要命，有的托辞不在家，有的说是政治问题，也将被牵连，千万不可再找他们，人人自危。我只好直接去找毛人凤，先是不见，后让李希晨转告我：马的事闹大了，他也作不了主，家属不要多问。第三次再去找毛人凤时，是一个清晨，正赶上他与刘秋芳从里面走出来，毛对我说，马是“老同志”了，问题弄清楚就行了，家里不必担什么心。一副奸诈的笑容，令人悚然。那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弄清案情、罪名。有人让我去找李宗仁打听原委。一天我接到行辕的一个电话说：“听说你要找李副总统，关于马的事他知道，转告你不要去找他。”

这时，有人把军统逮捕马汉三的内部通令抄来，通令的大意是：戴笠死后，马汉三等人私结小组织，成立“建国力行社”，网罗党羽，分裂党国，破坏军统铁的纪律，必须严惩法办。所有参加此小集团者，必须立即自首……。(原件我于解放初曾抄送军管会。)

七月六日上午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被秘密用飞机押解南京。毛人凤、李希晨等也相继离开北平。这时，在北平的一些大特务们才稍稍松了口气。有人暗中转告我：马的事与郑介民有关，应速去南京找郑设法营救；至于马汉三的罪名，有些是莫须有的，应准备证据去南京要求公审，例如侵吞查抄敌伪财物，私存于中央银行一事，事实这部分财物早有清册送呈过戴笠和蒋介石，有些财物已由军统解送南京，余下的也有清册，实物则由中央银行收管；再如关于马汉三与刘玉珠开办信托公司搞投机生意事，事实上也是军统默许的，刘玉珠曾送给毛人凤和郑介民一些股份。有人还把有关的档案拍成照片给我，大约有二十多张，准备做申诉的证据。

大约过了两个月，传言愈来愈严重，可是除家属外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说一句话。刘玉珠、乔家才二人的家属则认为是受马汉三的牵连，应由我去南京打探消息。我从未自己出过远门，人地两生，对这种事更不知怎么办。幸赖马汉三原在西北军时的旧友高兰溪帮忙奔走，才到了南京，好不容易见到了郑介民。他对此事甚为恼火，可他却表示：马汉三的事搞到了他的头上，他无法说话。他不同意以家属的名义要求公审，他说：“保密局从来没有公审一说。”当看到一些申诉的证件、相片等物时，又十分“关切”地说：“证件很重要，还应多搞一些，如刘玉珠信托公司的资本来源等。马汉三既解来南京，一时不会有什么事，还是早些回去弄材料为好。”这说明郑介民明知马汉三是他的替罪羊，但只求保住自己，并不想真正去管马的事，死活由之了。我也去找过马志超(高兰溪与他也有旧交)，马志超只问了关于“建国力行社”及送郑介民股份事，然后托辞说：“传言太多，不好过问。”我去找李希晨提出探监要求，但只能在他的监视下与马汉三通了个电话，也就算是极大的照顾了。李希晨对我说，军统“守法”是常事，许多人都进过“大学”。^①马汉三是抗战“有功”的，“我以老婆孩子担保，马汉三没什么大事”。他还说：“你不可在南京久留，否则对马不利。”但就在这次谈话之后

^① “守法”、进“大学”都是军统内部的暗语，意即关禁闭。

三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七日的夜里，马汉三、刘玉珠二人就被秘密处死了。当时公开的罪名是贪污，各报纸都有披露。

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十分气恨，拿马汉三泄愤，杀一儆百。而马汉三在北平两年多，野心膨胀，一心向上爬，得罪毛人凤，自取其祸。

马汉三追随军统多年，干了不少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他替蒋介石卖命，最后还是死在蒋介石之手。在收回马的狱中遗物中，发现有一张用草纸写的“遗书”，大意是：以自己的“为人”，想不到竟落得个如此结局，孩子太小，如能活下去，万勿从事政治……这说明马汉三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本质。可谓至死不悟了。

家属庆新生

马被处死后，我曾去弓弦胡同找军统头子王蒲臣，要求发还查封的衣物。我亲眼看到特务们覆灭前的狼狈丑态。大厅里桌椅东倒西歪，地上烂纸厚厚一层，院里火盆正冒着黑烟，地上堆积着许多文件，大特务宋元和正领着一伙人手忙脚乱地翻着、烧着。宋元和威胁我说：“共产党来了，没你什么好处，共产共妻，你还要东西做什么！”我说：“有本事你们都带走！”从那时起，我逐渐醒悟，下决心从头做起，赌口气，一定要活得更好。

马汉三的死，对我是极大的解放。就在这时，东北已经解放，新的生活正在向我召唤。北平解放前夕，冯贤年对我说：“有办法的都跑光了，留下的都是替死鬼，不会再有人替他们卖命了。我和徐宗尧（围城时军统指派的负责人）联系接受和平解放。解放军对马汉三的事很了解，家属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在解放前没有工作过，对政治毫无认识，更说不上思想觉悟。从马汉三被处死的前前后后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排挤倾轧的事实，看到了特务笑里藏刀、阴险狠毒的狰狞面目，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黑暗、腐朽和反动。正当我走投无路彷徨不定的当儿，北平解放了！我也得到新生。党把我看作是受害的青年（解放时我二十五岁），给予我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三十多年来，我学习、工作、生活都很好，无时无刻不感到党的政策的温暖。我的子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都已长大成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建设而努力工作，全家都生活得很多。

作者附注：

文强、徐宗尧同志为本文提供了有关材料，谨表示感谢。

漫话青山居玉器市

李启元 陈德光

北京崇文门外北羊市口里有个青山居玉器市，过去一些经营珠宝钻翠、象牙雕刻、古玩磁器的商贩和做珠宝钻翠加工的手工业者，每天清晨都要到这里进行交易和招揽加工活计。这个玉器市交易繁盛，人烟稠密，车马行人常为之阻。现在，这个玉器市早已不复存在了。前不久，一家以“青山居”命名的专营珠宝钻翠、古玩字画的商店，又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开张了。看到那块写着“青山居”金字的匾额，不禁使人想起过去的青山居玉器市来。

要说青山居玉器市，得先从青山居说起。在明末清初，有个山东人鞠某在北羊市口里开了个黄酒馆，名叫青山居。这个小酒馆兼卖茶水，门前挂有两块横匾，一块匾文“陆羽三篇”，一块匾文“卢仝七盏”。陆羽和卢仝都是唐代的文人，均嗜茶，也会种茶、采茶，且好考究茶具。陆羽撰有《茶经》，被人视为“茶神”；卢仝著有《茶典》。青山居茶酒馆的生意兴隆，不仅因为有高手给写了这两块匾壮了门面，还因为地处繁华要衢。清时，崇文门是京城很重要的一座城门，是从左侧入京城的必经之地，南接运河，东下天津，给皇帝的贡物诸如帝室日用柴炭等，都要由此门输入。而崇文门外又有个税课司，统管京城课税，进京的货物都要在这里验帖上税。所以，各行各业的人，多找附近的茶酒馆打尖歇脚，青山居茶酒馆自然是买卖兴旺了。

明末清初北京城内还没有玉器市，只有古董铺，但全城亦不过十数家。古董铺经营的货品种包罗万象，举凡珠宝钻翠、陶瓷器皿、象牙犀角、古墨宝砚、法帖字画、钟表什物一概经营。到清末，古董业中人深感掌握如此众多经营项目的本领不易，才各吃一门，把行业项目分散，玉器行即“红货”行，才单独分了出来。开始，从事玉器行又有雄厚资本开座商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没力量开业，均以“跑城儿”糊口。“跑城儿”，就是玉器商人每天到全城各处沿街巷向各家住户收买玉器什物，然后再拿到“掇上”去卖。“掇上”就是同行人约定的几个茶馆，大家每天都到那里去交易，青山居茶酒馆即是其中之一。随着清王朝的衰败，一些王公大臣的潦倒，官宦人家珍藏的珠宝玉器常被跑城儿的买到手，跑城儿的也颇能赚大钱。因此从事玉器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很需要有个交换行情、进行交易的场所，遂有人提议就在崇文门外磁器口内药王庙路北开设了一个琳琅馆玉器市场，这是北京的第一个玉器市场。

琳琅馆玉器市开设之前，虽然早在清乾隆年间玻璃厂火神庙内就有了珠宝玉器市，每年正月初四至十五日准许摆设玉器摊，但这个庙市是直接把玉器卖给用户，据传只许三品以上的官员及其眷属进入选购，并不是玉器业商人相互交换行情和交易的地方。琳琅馆玉器市的开设，则使玉器业行业中人有了聚会磋商业务的场所。不久，琳琅馆玉器市因坐落的地点太偏僻，又因青山居茶酒馆的主人多次邀请，这个玉器市就迁到青山居茶酒馆来了。

青山居玉器市最初只有三十个摊，连同其隔壁露碧阁里摆的十几个摊，也不足五十个摊。民国以后，外地和外国商人来京做珠宝钻翠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青山居玉器市也就中外驰名了。青山居茶酒馆的地方不敷玉器集市应用，于是，在北羊市口南段的上四条胡同

里也逐渐有了玉器集市摊贩。每天早晨六点钟左右，一些玉器商就用木板架上板凳，支起临时货摊，有的还用苫布搭起简易凉棚，摊子一个接一个。赶集市做生意的人你拥我挤，甚是热闹，集市一直到上午九、十点钟而罢。

在青山居玉器市上交易的货物品种，大致可分翡翠、珠、钻、宝石、杂项、器皿等几大类，分述如下。

翡翠：翡翠又名硬玉，分翡和翠两种。翡色红，翠色绿。一般说来，翠比翡的价值高。翠绿又分菠菜绿、子母绿、老绿、干绿等多种。翠的价值高低不仅要看翠石的大小和色泽，还要看它的质地成分，一般以其玻璃体光泽半透明者为佳品，翠以似假实真为上，因为看来似假的、实际是真的，这种翠最为难得，也最难于鉴别，所以在市上都争着观赏鉴定并出高价抢购。翠上有毛病叫有绺，即人为或自然形成了线道。绺分深浅，绺浅的翠买回来可以加工磨掉，但不能磨伤影响其体的表面光泽。所以，有些手工业主就用低价从市上买回有绺的翠，经加工磨制后当作好翠再高价出售，很能赚钱。

珠：珠分真珠、养珠、碎珠三种。真珠珠色乳白或略带黄色，有光泽，不一定很圆。养珠是人工培养的，较圆。碎珠是真珠或养珠的残碎品，在市上交易多销往中药店做珍珠粉的原料。过去在青山居玉器市上，常见有珠宝商人买到清代官宦的朝珠，然后分等按个转售。

钻石：钻石在青山居玉器市开市之初很少交易，因当时我国还不能做钻石的工艺加工。抗日战争胜利后，钻石在这个集市上逐渐多起来。钻石以没底漏的为佳品。所谓没底漏，即钻石的多面体成锥形，没脏，质地纯。钻石有纯白和稍蓝两种色泽。这个集市上收售作为装饰品的钻石，钻石摊按销往地不同分为东洋庄和西洋庄。

宝石：宝石又分红宝石、蓝宝石。蓝宝石以六道线、反光为佳品。有的蓝宝石不出六道线，但经手工业者从市上买回加工磨制，能磨出六道线来，可以在集市上再高价售出。

杂项：青山居玉器市上交易的杂项有珊瑚、青金、琥珀、玛瑙、水晶、黄晶等。

器皿：这个集市上交易的器皿大多是手工业者用白色玉石雕琢磨刻而成，多为宝塔、炉、鼎、笔洗、人物、鸟兽。清末和民国初年，在青山居玉器市上如果出现一个年代久远的鼻烟壶，无不视为珍贵的古玩，争相品评，重金收售。如：一个雍、乾时期的辛家坯料壶，约值白银千两；袁氏坯料壶，一个也值银三百两；其他如古月轩料壶，马少轩的里画壶，一面有画一面有字，均是名品，价昂贵。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青山居玉器市是集珠宝、钻翠、古玩、杂项之大成，琳琅满目，光彩照人，不仅行业中人要争相光顾，以获巨利，同时也常招徕外国人到此游观。

每天光顾青山居玉器市的本行业中人，按其不同的经营方式，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一、做“刀吃”货的。这种人是亦工亦商，又做买卖又做手艺。他们从集市上买回料子，回家磨成戒指面、马蹬（一种形似马蹬的首饰）等成品，再拿到集市上出售。

二、开手工作坊的。这种人开手工作坊，收徒弟，雇伙计，家里有几张大水凳等操作工具。他们从集市上收买原料，加工磨制成成品后拿到集市上成批发售。

三、座庄。座庄是派人专门从集市上买回成品，销往外地或卖给外商，也直接卖给使用者。他们只在集市上趸货，不在集市上转手倒卖。

座商又分有字号的和没字号的两种。如上四条一带的天兴号，聚古斋、振德兴、同聚祥等店铺，均为有字号的座商。但有的座商虽然有字号，却没有门面。没字号的座商，没有门面，属连家铺性质，但有的也有徒弟、伙计。